

Лев Толстой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国内首次推出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真正原始版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ЛЕВ ТОЛСТОЙ

[上卷]



国内首次推出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真正原始版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ЛЕВ ТОЛСТОЙ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赵桂莲 / 译

[上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赵桂莲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059-7018-2

I. ①战… II. ①托…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063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09-5801 号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Первая версия 1866 года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ахаров, 2000

书 名	战争与和平 (上 下)
作 者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赵桂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柏松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5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018-2
定 价	7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生命胜于死亡

——译者序

“列·尼·托尔斯泰从1863年起开始写作这部小说,1866年年底在手稿第726页写下了‘完’这个词”^①,这基本上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战争与和平》“第一个版本”的面貌,当然,如该书俄文版2007年第二次印刷时版权页上所标注的,“在预备该版本时使用了艾·叶·扎依坚什奴尔在《文学遗产》第94卷中发表的文本、列·托尔斯泰90卷纪念文集第13—16卷中的小说手稿资料以及1873年发表的作家生前第三版四卷本小说”。

在俄罗斯“扎哈洛夫”出版社2000年第一次印刷该版《战争与和平》时,编者于书籍封底印制了这样几句话,以此表明该版本与流传至今、广为人知的1873年版的区别:“1. 篇幅减少一倍,有趣度增加四倍;2. 几乎没有哲理插话;3. 阅读起来轻松百倍:全部的法语文本皆由作者本人译成俄语;4. ‘和平’的部分大增,‘战争’的部分大减;5. 安德烈公爵和别佳·罗斯

^① 列·尼·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编者序》,“扎哈洛夫”出版社,2007年。

托夫活着。”2007年第二次印刷时编者把第五条改为“快乐以及……”这一条编者写的是俄语字母标注的英语。

英语和省略号带点调侃的味道,想必这种调侃与该版小说印刷后引起的反响有关。从2007年俄文版编者序中我们看到:“一些自诩为俄罗斯文学行家的狂妄无知的评论者开始公开指责我,说我是在伪造赝品(‘这一切都是扎哈洛夫本人的涂鸦’),说我在践踏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可不会出版这第一个版本,是您……’)”^①

不过,从小说的创作历史和出版历史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手稿的最后一页写上“完”字之后曾经计划出版这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出成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自诩”为“行家”的评论者是真的“狂妄无知”,还是有其它原因,但阅读这个版本感到吃惊是难免的。俄文版编者罗列的五个特点虽然具有推销的广告意图,但却的确是该版区别于后来版本的显著特点,而这些特点让熟悉《战争与和平》、熟悉托尔斯泰的人有些不习惯,尤其是第二个和第五个特点。

“几乎没有哲理插话”(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的),那还是《战争与和平》吗?还是托尔斯泰吗?要知道,迄今为止不少评论家,其中也包括一些为托尔斯泰的才华折服、真心热爱他、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们对托尔斯泰艺术创作中的“说教”不满意,认为它们无疑损害了其艺术创作的价值,因为艺术家展现思想要靠“艺术表现”,而不是靠“说”。

其次,活着的不止是安德烈公爵、别佳·罗斯托夫,一些后来死了的人物在这个版本中继续活着,因此小说的调子没有那么灰暗,结局如童话一般美好,“两个婚礼(皮埃尔与娜塔莎和尼古拉与玛丽亚公爵小姐)同一天在奥特拉德诺耶庄园举行,庄园又重新活了起来,兴旺起来”,也因此如俄文版编者所言,小说“快乐以及……”。可实际上我们知道,死亡的阴影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一直挥之不去,从其早

^① 列·尼·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编者序》,“扎哈洛夫”出版社,2007年。

期作品《童年》开始,死亡是贯穿始终的主题。除了以死亡为主题、死亡如影随形伴随主人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死亡描写主要有三段:一是《童年》中小主人公尼科连卡在母亲遗体告别仪式上从农妇五岁的小女儿扭曲的脸上和非人的尖叫中“看到”的死神,二是作家本人在“阿尔扎马斯之夜”亲眼目睹的“红色的、方形的”死神,再一个就是1873年版《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临死前潜意识中与死神生死对决、拼命关门抵挡其进入房间的情景。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死亡在这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是有形的,看得见的。

尽管如此,虽然托尔斯泰对死亡的记录让读者目瞪口呆,但与此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作家对生命的热爱、其不同时期艺术作品中主人公旺盛的生命力更加令人难忘,或者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死亡如此可怕,如此生动,生命才更加可贵,更加令人不能割舍。

生命力之旺盛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唯其如此,俄罗斯白银时代众多思想观念各异的哲学家、作家却就此形成了共识,虽然表达方式各有特点:维列萨耶夫认为那是“活生生的生命”;梅列日科夫斯基把托尔斯泰定义为与“精神的洞察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呼应的“肉体的洞察者”;别尔嘉耶夫在其创作中发现了“旧约的成分”,亦即杂糅着多神教信仰的自然崇拜和生命崇拜;神学博士弗拉基米尔·伊里因发现的是自然神——“潘神元素”和“自然性”或“自发性”;俄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宁直接指出,托尔斯泰属于那样的古老家族,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属上品,其强壮有力是尽人皆知的”,“整个世界文学中……不曾有一个人能够如此敏锐地感觉世间的一切血肉之躯……”^①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部分评论家对托尔斯泰“说教”的不满,通过这些评述同样可以发现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真正擅长的功夫。比如,历史学家伊万·伊里因在评价1873年版《战争与和平》时就详细

^① 布宁:《托尔斯泰的解脱》,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3、107页。

地阐明过这一点：“艺术家永远不能忘记，他应该艺术地说话，他的语言是形象，而表达的方法是形象性……”可是在这部小说中“似乎有两个人同时在说话并且常常打断对方：一个是用心感知和表达并且陶醉于自己的感知和描写的艺术家；另一个是带有倾向性的思想家—说教者，对于他来说当个艺术家不够，他总是准备着对一切都反反复复地进行裁剪，因此小说的风格符合这一点：它具有双重风格，有两种本质，两个特征”，不过，“一旦理论说教者消失，一旦兴奋异常的艺术开始自由地说话和歌唱，风格就立刻变得轻松、灵活、无忧无虑、飘逸、充满韵律、令人愉快和充满表现力；而一旦无所不知、带着一张令人讨厌的、谴责一切的干巴巴面孔的理论说教者出现，风格就一下子变得重浊、抽象、干硬、磕磕绊绊、平庸，有的时候简直是非文学的、语法不规范的风格。”^①

屠格涅夫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这部小说中有那样一些在欧洲除了托尔斯泰谁也写不出来的东西，它们使我激动得发抖，激起了我强烈的享受；这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但也有太多不成样子的东西。……托尔斯泰肯定是骑在他喜爱的小马身上，发明出某个体系，他觉得这体系可以非常容易地解决一切……不过，当托尔斯泰接触到地面的时候，他就像伟大的巨人提坦，又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力量。”^②

列斯科夫在1869—1870年的俄国《股市通讯报》上发表了数篇评价《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肯定这是“最优秀的俄罗斯历史小说”、“当代文学的骄傲”，但与此同时含蓄地表达了他的遗憾：“可以在一定的角度上把托尔斯泰伯爵的小说称为伟大的人民战争的叙事诗，这战争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但却远说不上拥有自己的歌手……”因为1868—1869年《战争与和平》经过作家的第一次改写正式出版了

① 伊·伊里因：《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灵魂的阐释者》，载《伊万·伊里因文集》（十卷本），第6卷第3册，“俄罗斯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432—440页。

② 《伊·谢·屠格涅夫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8年，第187—188页。

第一个全本,可以推测,列斯科夫的评论针对的正是这个改写过的版本。该版本与1866年版相比,除增加了部分细节、故事叙述时间由1813年延续到1820年并因而使小说篇幅大大增加以外,较之最初的版本,作为“说教者”的作家本人出场的次数也更加频繁了,发表的议论也更多、更长了,列斯科夫的遗憾正是由此而来。

上述几位论者如果面对的是1866年年底完成的《战争与和平》,或许不满和遗憾会少一些,因为这里更多流露的是布宁所说的“生命的活力”,更多体现的是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而非“说教者”的一面。不过,1866年版中所谓“自然主义”的成分更显著一些,部分看起来随意性比较强的情节虽然更多体现了作家本性中的“原始性”、“自发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艺术的美学原则。

比较两个版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发现托尔斯泰思想观念的转变。比如,在皮埃尔人生道路上发挥过极其关键作用的共济会恩主奥西普(“第一版”中名为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老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在前一个版本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后者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这说明托尔斯泰后来在修改小说的过程中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 and “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更趋鲜明,对“人民真理”的追求更趋自觉;娜塔莎没有变成再也不去展现美妙歌喉、令人感伤的“雌性动物”以及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这应该与作家后来对婚姻、妇女的地位及职责的认识有关,在紧随《战争与和平》之后创作的“家庭主题”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深化了对该问题的思考;后来的版本中多了一些死亡描写,尤其是安德烈公爵临死前惊心动魄的肉体和精神挣扎,这只能说明在托尔斯泰几乎全部的创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死亡旋律从70年代开始越来越响亮地回旋在他的灵魂之中,直至生命的终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866年版中的《作者序》,指责扎哈洛夫“践踏”托尔斯泰的那些评论人最强烈的愤怒恐怕就在这里。的确,很难想像一个因为倡导“人民化”、穿农夫长衫、与农夫一样犁地而被狂热的“托尔斯泰教教徒”强行供奉到神坛的“教主”会如此蔑视人民,为此还如此理直气壮、沾沾自喜。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非同凡响的一生,这种不同凡响不仅表现在他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与思想著作,更直接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以及他的气质之中。

谈及1812年战争时托尔斯泰写过这样的话:“在研究如此富于悲剧性、重大事件如此繁多、与我们那么接近而又留下那么多形形色色有关它的传说的这个时代时,我得出一个明确无疑的结论:发生那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我们的头脑无法了解的。”^①可以说,把“它”和“时代”换成“他”和“人”,这些话同样适用于对作家本人的认识,因为作为人、艺术家、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表现出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有目共睹。

一直以来,托尔斯泰展现出的总是两个极端的形象,复杂矛盾个性的集合体:青年时代堕落荒唐的生活与后半生的返璞归真、禁欲主义;激烈地反抗教会但却从未停止过寻找他自己的上帝;看重家庭和家庭责任但却离家出逃……托尔斯泰夫人在给全家的朋友诗人费特写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丈夫形象中的两面性:“一面是狂热地追逐尘世间的一切幸福,狂热地享受一切:大自然、音乐、快乐以及一切一切给人带来欢乐的东西;而同时存在着另一面:为了爱邻人、使全体人共享一切幸福而否定这一切,痛苦不堪地渴望抑制这一切。”^②在其它场合托尔斯泰夫人对朋友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幸福的人忽然像他一样,只看得见生活中丑恶可怕的东西,而闭眼不看美好的东西,那么他一定有病。”^③因此她才会无可奈何、悲痛欲绝地慨叹:“我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共同生活了48年,末了也没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④

弗·伊里因在总结托尔斯泰行为的时候说得好:“托尔斯泰如同

① 列·托尔斯泰:《就〈战争与和平〉一书说几句话》,载《列夫·托尔斯泰文集》(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② 《费特文集》(两卷本),第2卷,“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20页。

③ 转引自布宁:《托尔斯泰的解脱》,第113页。

④ 引自2009年9月3日俄罗斯“文化频道”播出的纪念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诞辰165周年纪录片《做天才的妻子》。

尼采一样否定(作为价值体系的)文化,只不过与尼采不同,托尔斯泰是为了道德而否定,尼采是为了美学而否定。但二者进行的都是文化重估。”“托尔斯泰……是摧毁者。”^①在另一篇文章中该学者进一步阐释了作家非同寻常气质的源头:“列夫·托尔斯泰是典型的天才。而一切法律都不是给天才写的。更准确地说,天才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而“天才首先是一种自然本性的存在——这是他压倒一切、焚毁一切之力量的源泉,是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源泉……”^②

天才的复杂性、矛盾性或两面性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天才托尔斯泰尤其值得关注,这不仅因为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更因为“他身上有一百个完全不同的人”,为感悟生命的真谛他上下求索,“环绕自己8万俄里”。^③

关注天才艺术家的切入点应该是事实,并且主要不是“说出来”的事实,而是通过艺术形象、艺术思维有机表现出来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带有倾向性说的话相对而言少、自然表现出来的情节占据主导地位的1866年版《战争与和平》是用来关注的绝好对象,更何况它“篇幅减少一倍、有趣度增加四倍”呢!

2010年12月5日—10日于北大燕东园

① 弗·伊里因:《托尔斯泰之谜》,载《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的世界观》,“俄罗斯基督教人文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

② 弗·伊里因:《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潘神元素》,同上,第219页。

③ 转引自布宁:《托尔斯泰的解脱》,第82、116页。

作者序

迄今为止我只书写公爵、伯爵、部长、参议员及其后代，恐怕以后在我的历史中亦将不会有别的人。

或许，这不好，公众会不喜欢；或许，对于公众来说农夫、商人、粗人的历史更有趣些，更有教育意义一些，尽管我全部的愿望是拥有尽量多的读者，但我不能迎合这样的趣味，原因有很多。

其一，因为我写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仅只保留在高层有学识的人的通信和笔记之中；我甚至仅只从这个圈子里的人那里才得以听到有趣的、有智慧的叙述。

其二，因为商人、马车夫、粗人、流放犯和农夫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单调、枯燥，在我看来，这些人的种种行为大部分源于同样的动机：对更幸运的阶层的嫉妒、自私和物欲。纵使这些人的行为并非全部源于这些动机，但他们的行为却被这些动机包裹得如此之严实，以至于难以弄懂他们，因此难以描写他们。

其三，因为这些人（低级阶层的人）自身中少有时代的印记。

其四，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不漂亮。

其五，因为我从来都弄不懂站在岗哨边的岗警心里在想什么，吆喝着叫卖吊裤带、领带的商贩心里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当粗人第一百次被带去用树条

抽打的时候他心里想什么……我弄不懂这些,就像我弄不懂给母牛挤奶的时候它在想什么、驮着木桶的马在想什么一样。

其六,这也是最后一个原因(而这,我知道,是最好的原因),因为我本人属于高级阶层、上流社会并且我爱这个阶层和社会。

我不像普希金骄傲地说过的那样是一个小市民,并且我大胆地说,我是贵族,就出身、习惯和地位来说我都是贵族。我是贵族,因为回忆祖先——我的父辈、祖辈和曾祖辈,我不唯不感到惭愧,而且感到尤为高兴。我是贵族,因为从童年起我受到的教育就是爱和尊敬不仅表现在荷马、巴赫和拉斐尔作品中而且反映在生活所有琐碎细节中的优雅:爱干净的手,爱华丽的衣服、雅致的桌子和马车。我是贵族,因为不论是我、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祖父都未尝贫窘,未曾经历过良心与贫窘之间的搏斗,从来都不必嫉妒任何人,不必奴颜婢膝,不知道需要为了钱和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而让自己变得更懂事一些,没有经历过处于穷苦中的人遭受到的类似的种种考验,这让我感到如此幸福。我认为这是巨大的幸福并为此感谢上帝,但如果这种幸福不属于所有的人,那我也不认为因此就有理由摒弃它,不去享受它。

我是贵族,因为我不相信一个用手指挖鼻孔、不断打嗝的人会拥有崇高的智慧,拥有细腻的品味和伟大的荣誉感。

这一切很愚蠢,或许,它是犯罪,是放肆,但这是实情。因此我预先向读者声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从我这里可以期待到的是什么。还来得及合上书并且谴责我是白痴,是一个复古分子,是我要借此机会赶紧宣布我对其怀有真诚、深刻、严肃敬意的阿斯科琴斯基^①。

^① 维克多·伊帕季耶维奇·阿斯科琴斯基(1813—1879),俄国作家,新闻出版家,历史学家。阿斯科琴斯基是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185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当代鬼王》是俄国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借助小说主人公作家谴责了当时被认为是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怀疑论者、虚无主义者、革命者(即“当代鬼王”)的所作所为,批判他们用廉价的西方文明取代具有恒久价值的正教文化,警示读者防范他们对俄罗斯生活和文化的荼毒与威胁。针对赫尔岑1857年创办的杂志《警钟》,阿斯科琴斯基于1858年创办了周报《家庭对话》,宗旨是从正教的、爱国的立场揭示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价值,把俄罗斯人民与“当代鬼王”对立起来。由于当时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同情“当代鬼王”,阿斯科琴斯基也就顺理成章被冠以了“复古分子”、“反动派”等名头。

第一部

“是吧，公爵，热那亚和卢卡^①充其量不过是领地，波奥拿巴^②家族的领地而已吧。不，我先把话给您放在这儿，如果您不告诉我我们要打仗了，如果您允许自己维护这个反基督（是的，我相信他是个反基督）的所有污浊和可怕之举，那我就再也不认识您了，您不再是我的朋友，您不再像您说的那样是我忠诚的奴仆。好了，您好，您好。我发现我吓着您了，请坐下来，说说看。”

一八〇五年七月，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亲信，著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迎接第一个赴约来参加晚会的重臣瓦西里公爵时说了这些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就像她说的，她得了流感（流感当时是个很少用的新词），因此她没去当班，也没出过家门。清晨由红衣仆役送达的字条上千篇一律地写着：

如果您家有伯爵（或公爵），无任何更好消遣，并且如果一个可怜病人的晚会不使您过于恐惧，那么我将十分高兴在七点至十点之间于家里见到您。

安娜·舍列尔

“啊，多么残酷的攻击！”走进来的公爵回答，丝毫不因这样的会见感到窘迫，微微笑着，狡黠的脸上表情愉快。他穿着朝臣的制服、长袜、高跟鞋，佩戴着各种星章。

他说的是那种我们祖辈不仅说而且用来思考的优雅法语，用的是那

① 卢卡是意大利中部一个地区。

② 意大利贵族姓氏“波奥拿巴”是拿破仑祖辈的姓氏，“波拿巴”是其法语形式，1804年拿破仑宣布自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以后采用了这一法语形式，同时也宣布他从意大利科西嘉半岛的一个破落贵族成为欧洲的主宰。小说中的人物使用“波奥拿巴”一词基本上都带有鄙视的味道。

种在上流社会和宫廷如鱼得水的显要人物所固有的安静的、庇护人的腔调。他走近安娜·帕夫洛夫娜,向她俯下自己香喷喷的、华发之间甚至闪着白光的秃顶,吻了一下她的手,然后安然地在沙发上落座。

“首先说说您的健康情况如何,可爱的朋友?好让朋友安心。”他说道,声音没变,语调里由于彬彬有礼和同情的缘故透出一种冷漠甚至嘲讽的意味。

“当一个人精神上承受着苦难时,您怎么能指望他健康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一个人有感情时,难道有可能安之若素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您整晚都会留在我这里,是吧?”

“英国使臣的纪念活动怎么办呢?今天礼拜三。我应当在那边露面,”公爵说,“女儿会来接我,载我过去。”

“我以为今天的纪念活动取消了。我说实话,所有这些纪念活动和焰火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假如他们知道您有此心愿,纪念会就会被取消了。”公爵依着惯性说道,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说出的事情他自己也不希望有人会相信。

“不要折磨我。好了,有关诺沃西利采夫^①紧急报告的事是怎么决定的?您全都知道。”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用一种冰冷、倦怠的语气说道,“怎么决定的?决定是:波奥拿巴破釜沉舟了,那我们似乎也准备破釜沉舟。”

瓦西里公爵不管说聪明的话或是蠢话、动人的话还是冷漠的话,使用的都是那样一种语气,似乎他重复说了一千遍,如同一个演员在演一出老剧中的角色,似乎话语没有经过他的大脑,似乎他不是用头脑、不是用心在说,而是凭着记忆,只是嘴唇在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正相反,尽管四十岁了,但她充满活力和激情,多年的经验使她勉强把活力和激情抑制在宫廷近侍多虑、礼仪和节制的框架范围内。她好像每一分钟都要说出什么多余的话来,尽管距此仅差毫厘,但这多余的话还是没有破口而出。她说不上好看,但看

^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诺沃西利采夫(1761—1838),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堡科学院院长。

得出来,她本人意识到自己目光中的热情和微笑中的活力——这目光和微笑表达的是对最高趣味的迷醉——使她拥有被称作趣味的东西。瓦西里公爵的话和表情说明,在他们二人周旋的那个圈子里大家早就形成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是一个可爱善良的热心人和爱国者的共识,她有点多管闲事,常常陷于极端,但因其情感真诚和热烈而可爱。做一个热心人成为她的社会状态。因此有的时候,就算她不想那样,为了不使认识她的人期待落空,她也会成为一个热心人。常常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演戏的克制微笑——尽管那微笑不适合她上了年纪的面部线条——表明,如同被惯坏的孩子,她常常能意识到自己的可爱毛病,而对这个毛病她不想、不能、也不认为有必要去改正。

去巴黎和谈的诺沃西利采夫紧急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到了柏林以后诺沃西利采夫得知,波拿巴在表达通过俄罗斯斡旋与英国和解这个意愿的同时颁布了把热那亚共和国归入法兰西帝国的法令。诺沃西利采夫在柏林停下来,认为波拿巴的如许强人所难之举可能会改变皇帝的意图,他垂询陛下的恩准,是去巴黎还是返国。给诺沃西利采夫的答复已经拟就,明日就该发出。占领热那亚是宣战的好借口,朝臣们比军队更主张打仗。答复是这样写的:“我们不想与在表明和解意愿的同时继续入侵的人谈判。”

这一切是当天最新的消息。看来,公爵通过可靠渠道得知了这一切细节并戏谑地把它们转述给了宫廷女官。

“看吧,这些谈判把我们引向了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就像整个谈话一样用法语说道,“看哪,所有这些谈判导致了什么?要的不是谈判,受难者的死要用恶棍的死来偿还。”她说,鼻翼张开,在沙发上扭动着身体,随后就报以了微笑。

“您多么嗜血,亲爱的!政治上发生的一切与客厅里不一样。有防范措施。”瓦西里公爵面带忧郁的微笑说道,这微笑不自然,但因为重复了三十年,因此它长到了公爵衰老的脸上,看起来又不自然,又习以为常。“您家人来信了吗?”他补充了一句,看来他认为宫廷女官不配进行严肃的政谈,因此努力去转移话题。

“但这些小心谨慎使我们得到了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不屈不